中国首批官费留美幼童撤回的原因

刘　可

清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元年（1875）间，清政府选派幼童百二十一名赴美国留学。实行办法为分期派遣，时间首尾计二十年，出洋幼童由清政府委派专员管束。这是近代教育史和洋务运动史上前无先例、颇具影响的一桩事件。由于其系首创，筚路蓝缕，在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禁锢深重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结局是守旧的封建主义势力占据了上峰，学期未满，幼童悉数撤回，留学计划中道夭折，为有识之士扼腕浩叹。此事变已载入史册，共为人知。

可是究竟何种原因导致了此种不慊人意的结局？由于当事者之一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广为流传和他在书中所表现的强热的愤慨情绪，在人们的记忆中，最后一任出洋肄业局委员吴嘉善成了"留学界之大敌"，学生无端被撤回的肇事者。然而事件的实际过程和撤回因素远比容闳的记载复杂、曲折、矛盾可谓源远流长，容闳的看法存在着历史的误会和片面性。本文欲就现存的史料，说明裁撤出洋肄业局、调回留美幼童事件的始末及就里。

一

分期四年派出的中国幼童，年龄最幼者十岁，最长者十六岁，他们大多数来自与洋务活动有关的或劳动人民家庭，本身较少封建道德规范的束缚。到美国后，分别被安排在愿意承担其食宿的美国教师家中，"随其子弟就傅习洋文"，①在通过小学、中学的补习教育后，升入大学学习。幼童们的汉文学习由正委员负责监督，局中特设汉文教习二人，"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习汉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②由于幼童们与美国教师、监护人、同学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加之其年少可塑性强，"他们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除了学业上有所成就外，在行为举止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一反中国旧式教育的常规，喜爱户外运动的"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他们脱去长袍马褂，换上穿着方便、易于活动的西装，有的甚至剪去发辫；因为"呼吸自由独立的空气"，他们忽视局中死板繁褥的礼节，有些人则公开信奉并加入基督教，到教堂去做礼拜，听布道。这些变化首先引起肄业局中极端守旧分子的惊慌，在他们眼中，幼童的行为完全是无君无父，不忠不孝的"叛逆"之举。③然而与之相反，这却正是留学事业的倡导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美毕业学成回国的学者容闳所期待盼望的。

事实上，从制定留学计划之初，容闳的目的与清政府的设想即是南辕北辙。清政府及其属下把派遣留学生当作自强运动的一个步骤，妄图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装备、维持已经腐朽了的封建政权和制度，出现起死回生的客观效果。他们不曾料到在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亦会渗透以至占领幼童们的头脑，长期受西方文明熏陶的幼童将会带回政治上的改革因素，事后幼童们的遭遇完全实了这一点。在幼童被敕命回国后，他们面对国内腐败的现实，就曾发生"彻底清除再改革的政府才适合治理她万千的子民"④的诅咒和感叹。

容闳则是一个几乎没有受过中国封建教育而直接由美国文明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爱国心促使他一生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富强；而他受到的美国教育则使他希望按照美国的模式改造中国，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试图引导并鼓励学生重复他在美国的经历，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社会科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他所造就的恰是封建主义的掘墓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他与清政府存在着貌合神离的分歧。他公开赞成幼童们"西方化"的思想和行动，违背了清政府计划的初衷；他对祖国和民族的忠心是无可指摘的，然而他默许以至于坚持的"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⑤的做法为一切封建士大夫不能容忍。容闳所经受的西方教育使他具有高明于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理想，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彻头彻尾的西方教育，使他对中国封建势力的保守性和腐朽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也缺乏应有的对策。仅凭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教育救国的改良理想，势必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一筹莫展，无所适从，最终必然鹿死他手。容闳倡导留学事业而中途失败这一事件，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精神方面勇猛奋进，而在力量方面却经常处于孤军作战，软弱无能境地的真实写照。

二

在出洋肄业局以及驻美公使团内部存在着的名为人事不和，实为两种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是导致留学计划失败的直接原因。

四品刑部主事陈兰彬出任洋局第一届委员（同治十一年七月至十三年冬），丁日昌之所以推荐陈兰彬与容闳合作，是考虑到他受过传统的科举教育，为进士出身。因为留学计划在原则和意义上都与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论相迕，有陈兰彬参予，"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⑥这种官场中的老谋深算即已为日后双方的冲突布下了危险的种子。与其思想守旧相关联，陈兰彬还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中庸之道的恪守者，不仅容闳记载他"所惜者胆怯而乏责任心耳"⑦连李鸿章亦持平公论他"素性拘谨畏事"。⑧由于思想迂腐和胆小畏事，他对洋局事务向无好感。在他担任委员期间，无论外交方面还是教育问题，与容闳"时有龃龉"⑨"意见咸相左"。⑩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陈兰彬因公卸任，之后洋局人事迭有更换，但无甚风波。

陈兰彬回国后屡经升迁，于光绪四年（1878）七月以驻美公使身份重履美土。可能由于他回国后曾对李鸿章面诉肄业局中的矛盾，李鸿章于是年八月十五日在给陈兰彬的复信中询问："容纯甫尚能和衷协力否，念念"，⑪对容闳已产生疑虑。陈兰彬到美后，容闳亦任驻美副公使，常驻华盛顿，交卸了出洋肄业局局务。光绪五年（1879）三月，主持肄业局的容增祥因父故世丁忧回国，容闳曾赴哈特福德"暂行摄理"局务。下半年，经容闳推荐，陈兰彬奏调驻西班牙参赞、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吴嘉善膺任该职。⑫此后，容闳虽然在内心极为关注留学事务，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关系尽力帮助中国留学生，但因任职和居住地的关系，实际上对留学肄业局的内务并无过多的发言权。

由于留学生是在吴嘉善任内撤回，容闳在其自传中对吴嘉善憎恶至极，多有扬恶之辞，如"留学界之大敌"，"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恶足以任留学生监督"⑬等语。但如果细心查索、对证史料，就会发现，此中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吴嘉善并非如同容闳描述得那样冥顽不化，手段卑劣。

吴嘉善虽然中过进士，点为翰林，但他的一生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他是清末翰林中学

外文的开风气之先者，这一点非但旅美多年的陈兰彬不能相比，而且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阶层中，若没有一定的见识和勇气，也是难以做到的。其二，他终生嗜好畴人之术，为清末著名的算学家之一，而且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多有研究，有译著流行于世。从这两方面看，他多少还沾有一些“洋”气，也许这就是容闳推荐他继任洋局委员的基本原因。

然而吴嘉善在国中虽堪称研讨西方文化的先行，但他毕竟为翰林清苑的正统出身，封建主义的传统教养和伦理观念深深地主导着他的思想和判断。他一触手留学生事务，在已迅速地“西方化”（此时的“西方化”比陈兰彬在任期内更深更烈了）的中国幼童面前，便呈现出叶公好龙式的复杂心理，产生了与以往行动相左的表现。在吴嘉善与容闳及他所维护的留学生中间，因为种种问题，譬如礼仪、入教、课程、运动、服装、经费等等，发生了诸多矛盾。容闳与留学生们将吴嘉善视为封建专制力量的代表，而吴嘉善则对学生们西方化的思想和举止大为惊恐和优虑。

派遣留学生一事当时已颇受国内守旧势力的非议，但裁撤之议并不始于吴嘉善。第二任肄业局委员区谔良曾于光绪六年（1880年）由刘坤一“转递节略一纸，条陈局中利弊，颇为详尽”，⑭ 李鸿章亦记区谔良有“中道撤回”之议。⑮ 吴嘉善初就任时，曾对陈兰彬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⑯ 后又多次寄函李鸿章，言“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⑰ 同年十一月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奏请确查洋局劣员，撤回入教学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上谕著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办此事，嗣后李鸿章“累次函告荔秋、子登会商莼甫妥筹应留应撤。或半留半撤之法”、⑱ 在此情形之下，吴嘉善审时度势，提出区别对待的变通之计，“后次来信，则谓学生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已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⑲ 李鸿章深韪其言。但身膺驻美公使的陈兰彬对留学计划心怀不满”，与莼甫牴牾已久，且其素性拘谨畏事，恐管理幼童与莼甫交涉更多或被掣肘”，又因其“年老多病，期满在迩，求退甚切”，⑳ 不愿再次经理留学生事务，于是他未经与容闳妥商，于光绪七年（1881）二月初六日径自以吴嘉善初议回覆总理衙门：“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则照其所言，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㉑ 数日之后，又寄电李鸿章：“日前覆奏已言裁撤此局，应由中堂奏明。……应否撤局，自由尊裁；惟兰彬弗能经理，万乞鉴原。莼甫如何，由其自报”。㉒ 由陈兰彬所言可以看出，他完全是由一已私利出发，做不负责的推诿他身居公使要职，竟不愿兼理留学生事务；他本人对留学计划深恶痛绝，但却借吴嘉善之口，正式提出了扼杀留学活动的奏议；他本有责任征求副使容闳的意见，但他却不予理采，瞒上欺下，使容闳处于无发言权和不甚了解内幕的境地。因此容闳只明陈兰彬、吴嘉善沆瀣一气，反对继续开展留学活动的一面，而不明陈兰彬比吴嘉清更狡猾、从中搬弄手脚、嫁祸于人的心机。所以在容闳的一生中，他始终认为吴嘉善是葬送留学事业的历史罪人。

在陈兰彬如此回覆总理衙门后，总理衙门依奏上闻，清政府遂于光绪七年（1881）五月十二日批准撤销出洋肄业局，调回全部留学生。容闳得知此项决定后，心情十分焦急和愤慨，他通过好友吐依曲尔牧师联络了美国各界人士，致函清政府，表示反对中国当局中途罢撤留学生，但这正义的呼吁被淹没在保守反动的逆流中，无论是容闳个人的反对还是美国知名人士的请求，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都是毫无功效的。

三

清朝统治集团、封建士大夫阶层以及襄办留学的官僚大臣的态度，终始左右着留学计划的命运。这是留学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是一群在政治上极端落后反动的封建贵族，他们为了延长自身的统治，虽然准许在其体肌上注射一些洋务活动的“健身剂”，但实际上并无长治久安、富国强兵的远见卓识，留学计划所以能批准实行，依靠的是曾国藩等人从中斡旋争取。李鸿章为此曾复信曾国藩：“陈荔秋与容闳建议派聪颖子弟赴西国学习，尊疏前已略陈，内无可否，其懵然不知，非不为也。此事先须议订条款，预筹经费。……若有眉目，请尊处挈敝衔会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发”。㉓所以说，从议办留学之初，最高统治集团即处于消极被动地位，其态度是可有可无，游疑不定的，而后批准留学计划，也是抱着试试看，或许有补于时局的侥幸心理。随着留学活动的逐步展开，以致其中产生了与封建主义制度相对抗的因素时，统治集团就会本能地借用他们手中的权力，采取断然措施，扼杀新生的进步力量。

朝野的清议亦可形成舆论的压力，在关键时刻促使清政府坠向倒行逆施的一面。以清未著名外交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为例，可以充分说明封建士大夫阶层对留学活动的看法。曾纪泽在其《使西日记》中说：“昔年陈荔秋、容纯甫率幼童出洋，纪泽侍太傅前，陈说利弊，……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曾纪泽尚为学贯中西、经世务实、头脑清醒的洋务派官僚，亦持此论，其余冬烘先生的奇谈怪论更为清廷的决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反动作用。

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一手经办出洋留学事务，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幼童的去留。在议派幼童出洋之初，李鸿章就对经费、人数、幼童的年令等项颇有疑虑。光绪四年（1878）在给陈兰彬的信中，已表示对容闳的不太信任。光绪六年（1880）在证实了容闳令“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后，曾去函责嘱容闳“勿固执已见”，并授权陈兰彬”令其（容闳—笔者注）不必多管”。㉔在容闳与陈兰彬、吴嘉善的矛盾中，李鸿章虽屡次寄函调停、疏通，但因“中国士夫议者纷纷”，担心留学计划一旦失败，自已“亦必大干物议”㉕，㉕因此他首鼠两端，为自已留有余地，赞成吴嘉善“续拟半撤之法”。㉖在撤与留的僵局中，李鸿章又于光绪七年（1881）四月十九日寄电陈兰彬：“将出洋局幼童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两月后文书到美，令伊等回华供差”。㉗此举不啻釜底抽薪，总理衙门深悟其意，在五月十二日的奏折中点明：“现调出洋学生二十名赴沪听候分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㉘事行至此，封建势力上下相通，留学计划左支右绌，余下的唯有任人宰割的命运。

此外，当时美国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留学计划继续实施的因素。一八七九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因与一八六八年蒲安臣条约相抵触，虽被海斯总统否决，但各种排华恶浪迭起；一八八〇年中美签定《北京续修条约》，明定美国有权限制华工入境；一八七八年容闳向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和西点军校提出中国幼童的入学申请时遭到拒绝；一八八〇年清政府派招商局轮船“合众号”首航旧金山，受到“额外加徵船钞货税”㉙的不公平待遇；凡此种种，引起清廷对美国政府和政策的不满，以罢撤留学生作为一种抗议的表示。

※　　※　　※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容闳酝酿、提出的留学计划本身与清政府的意图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此项计划从实施开始即基础不稳，危险四伏；清朝统治者从它的阶级本性出发，不允许有任何威胁其阶级权益的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存在，一旦此种苗头产生，它就会毫不留情地置之于死地；因此，当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观念发生冲突、矛盾激化时，封建势力必定会依靠其权力和传统观念上的优势而占据上峰。不难理解，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容闳“教育救国”的些许改良设想必然要幻灭。

①②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③《中国留学幼童书信集》（续六）高宗鲁编译，《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三期。

④同③（续四），《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二期。

⑤⑧⑰⑱⑲⑳㉖《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二。

⑥⑦⑨⑩⑬容闳《西学东渐记》。

四

（上接40页）

关于《永宪录》的作者，排印本称之为“萧奭”，《辞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亦缘此说。而李钞本的作者为“萧奭龄”。那么，究竟应从何说呢？笔者认为是后者。由于李钞本更接近于祖本，所以，从逻辑上判断，“萧奭龄”的可信程度要大于“萧奭”。应该说，这是排印本的脱字，而非李钞本的衍字。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排印本所据乃邓之诚先生所藏之钞本，而邓先生原藏于燕京大学之钞本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笔者将它与排印本做过比较，二者完全一致，来源于同一钞本。据钞者序言：“《永宪录》四卷，续编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可见，当时并不知作者为何人。后来是邓先生以吴氏《蕉廊脞录》中得知作者为“萧奭”。也就是说，“萧奭”的来源只有一个《蕉廊脞录》。而吴氏藏书已缺字十之三四，何以知其原序末句“乾隆十七年岁在壬申，嘉平上浣，江都草泽臣萧奭拜手恭纪”中就无脱字呢？从这个过程看，“萧奭”自然不如“萧奭龄”可信。其二，“萧奭龄”并非孤证，缪荃孙收入《古学汇刊》的《永宪录》，作者也是“萧奭龄”。此钞本虽很简略，但仍有价值，它不仅可与李钞本共同证明排印本的某些错误，而且在作者姓名上又与李钞本相同，这当然不能视为巧合。《中国丛书原录》收《永宪录》，乃缘《古学汇刊》作“萧奭龄”。综上，《永宪录》的作者似应以李钞本，作“萧奭龄”。

过去，对《永宪录》作者的生平无所了解，如排印本前言称：“著作生平事迹不详”。今据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八经籍，卷十二杂记下记载，《永宪录》的作者姓萧名猛，③家住江都县大桥镇，此地“聚落颇盛”。萧氏乃康熙间大桥镇四望族（汤、顾、萧、朱）之一。萧猛“为府学恩贡生，学问该洽相传。顾太史所刻时文移，皆萧平时塾课。《雄雉斋诗集》内有招萧席园小饮，辞以‘曝书不赴’之诗，其雅致可见。”查嘉庆十五年张世浣等修《扬州府志》卷四十一，知萧猛为康熙年间府学贡生。再据李钞本编凡例：“此编参互考证，三十年凡四脱稿。”而书成于乾隆十七年，那么，作者开始撰写当在雍正即位之初。这有助于说明，为康熙年间府学贡生的萧猛和李钞本的萧奭龄即为一人。如果萧猛与萧奭龄确为一人，那么，其姓萧，名猛，而奭龄即为其字或号。这样，我们对萧奭龄的事迹也可略知一二了。

①②详中华书局1959年版《永宪录》邓之诚跋。

③《江都县续志》卷八经籍，记《永宪录》作者为“肃猛”，卷十二杂记下，即称“萧明经名猛……”据此，“肃”为“萧”之误。

究，作了细致的订正工作。

在座谈会上，与会者还就清史研究和史书体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一些同志指出，在以往的清史研究中，往往只注意对前期历史的探讨，而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划入近代史的范围，排除在清史领域之外，这是很不科学的。尽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清朝的统治并未结束，只有把清王朝前期和后期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才能真正完整地反映清史的全貌。大家期望《简明清史》有关鸦片战争以后的部分能尽早问世。

关于史书体例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建国以后，国内学者撰写的断代史著作，几乎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简明清史》也是如此。这种体例有它的长处和特点，如历史发展的脉络比较清晰，某一时期各方面的问题比较便于集中论述等等。但这种写法，对一些重要专题却难以展开和深入，特别是绝大多数专著都使用同一体例，难免给人以单调之感。因此，以后编写清代通史性的著作，是否可在体例上作一些新的尝试，如在大致勾画出历史发展的轮廓之后，即分专题深入展开，从各个方面描绘一代历史的面貌，等等。当然，这些仅仅是初步的想法，史书体例如何更好地体现历史与问题、纵向与横向的结合，如何更好地反映一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尚有待于清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探讨。

与会者一致认为，清史研究是一个有着很大潜力的领域，随着我国历史科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空气的日益浓厚，方兴未艾的清史研究，必将出现更加繁荣的新局面。

《清朝兴起史》即将出版

周远廉同志撰写的《清朝兴起史》（三十万字）一书，最近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研究清朝开国时期历史的第二部学术专著。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清朝兴起的基本历史过程，分析了一个弱小的女真部落，四十年内迅速发展成为强大的后金国的原因、条件及影响。作者对清初的一系列疑案、冤案和错案，如太子之废、大福金之休、皇长子的死、弟贝勒的去世、虾阿哥的贬责、阿敦督堂的幽禁、额尔德尼巴克什的冤死，以及“哈达贝勒”的降职和四贝勒皇太极的被训斥，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再现了当时政局的风云变化。对清朝开国史中，一直为学术界所瞩目的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如明满关系、明清战争中明朝的腐朽、“经抚不合”的实质与努尔哈赤决策的两次失误、对金国汗、贝勒从任用、依赖汉官到疏远、怀疑和歧视，由“恩养尼堪”到捕捉“无谷之人”的政策上的改变，对满蒙联盟、八旗制度、“共治国政”和满族贵族的兴起，等等，作者也作了详细的具体的论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逻辑性强，图文并茂，值得一读。　　（**邱莲梅**）

上接24页

⑪⑮㉕《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八。

⑫同⑤，据容闳自传记载，吴嘉善就职时间为1876年，误。且记吴为陈兰彬”特荐”，或许由于容闳著自传时已年迈，记忆不清，误。

⑭㉘《洋务运动》（二）第166页。

⑯㉑同⑭，第165页。

㉒㉗同⑭，第181页。

㉓同⑭，第173页。

㉔同⑪，卷十九。

㉙《清史稿》卷一五六。